

两会后官员代表别又躲起来了

两会的开放成就了“媒体逼访” 中国青年报 3月11日 作者 曹林

中国青年报一评

地方官员向来对本地丑闻缄口不语或王顾左右而言他,外界炒得再热,风暴中心的官场却出奇地静默;高高在上的相关部委更是推得远远的,不会对地方事务发表看法。两会却把那些日常的清规戒律打得粉碎,将平常敏感和神秘的东西都脱敏和祛魅了,云南官员不避“躲猫猫”,河南官员也没有把“开胸验肺”和“跨省追捕”当成多么敏感的事。

3月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时,针对广西烟草局“日记局长”事件表示,他也听说了此事,但要由对其有管理权限的部门去调查,如果属实,一定要严肃处理。

(新京报 3月10日)

我想,如果在平常,河南官员肯定不会这么爽快地谈“开胸验肺”的,相关部委也会避之唯恐不及。可在两会上就不行了,两会现场中央和地方高官云集,记者在人民大会堂门外和蹲守在小组讨论会门口,官员们一出门就被无数个话筒堵上,上厕所都被围得水泄不通。这大概是“人大代表中官员代表比例过高”的一个好处:作为官员平常可以躲,可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两会上根本没有地方躲,极大方便了记者们使出各种看家本领围追堵截。

我把这场景叫做“媒体逼访”——两会的开放和透明给媒体“逼访”创造了一个条件。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我想,两会氛围就是创造的一种绝好的条件吧。

两会官员云集,而在平常要采访到这些官员不是很容易的。要经过无数道手续,最后很可能是“领导很忙”或“不便接受采访”,要不就以“请找我们的新闻发言人”为由而不接受采访。而两会就让那些采访的繁文缛节消解掉了,大会堂前随便就能拦到一个不小的官,哪里有什么程序,现场直逼,说不说?怎么说?看着办吧。

虽然也有官员以“这个话题很敏感”为由推开记者的话筒,但两会的围观效应,很快会让他受到批评。所以,两会也让那些敏感的话题脱敏了,不说或推卸可能会成为更敏感、更麻烦的事,敏感问题从来都是刻意捂出来的,越捂越敏感。

我爱这和谐的两会氛围。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总理的黄钟大吕之声,诚哉斯言。

现代快报再评

近日有报道说,中山大学毕业的林立峰在看守所呆了24小时,被公安宣布“发狂致死”,检察机关鉴定后告诉家属死者身上有伤痕多处,七根肋骨折断;便有记者打电话向湛江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梁泉求证此事,你猜得到的回答是什么?“你怎么可以随便就打电话给我这个政法机关的领导,一点规矩也不懂。”瞧,这位正处级领导多牛,他背后的“规矩”多牛!由此可以想见平时要落实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报道权、评论权是多么地不容易。

全国两会期间有所不同,官员代表或委员的政治素质相对较高,中外聚光灯之下更注重自己的形象,即便如此,还是出现了某省长因问了他一句“您如何看待邓玉娇案”导致“误会”而抢夺女记者录音笔的事件。

可见,温家宝总理说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绝不是无的放矢。批评和监督的环境还很不乐观哪!

为何宁死不当公务员

48岁的刘美艺(化名)至今没想通:自己深沉的母爱竟成了“杀”死女儿的凶手——女儿晓琳大学毕业后,通过网络从事自由职业,但在机关当领导的她认为这“工作”不稳定,四处张罗让女儿进机关端“铁饭碗”,却屡被拒绝。去年12月,一次争执之后,25岁的晓琳受不了母亲念叨,赌气从25楼的家纵身跳下……

(3月9日《城市晚报》)

爱为何成为“杀”死女儿的凶手? 羊城晚报 3月11日 作者 王石川

羊城晚报一评

普天下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美好而明媚的未来。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身为机关干部的刘美艺希望女儿端上铁饭碗,也是人之常情。但应该承认,在传统家长制文化依然有影响的今天,有不少家长把孩子当做附属物,当做实现自己理想或梦想的工具,不懂得尊重孩子。但是,问题又不止这么简单。

表面看,这是两代人之间的代沟,但实际上又不仅仅如此。刘美艺让女儿考公务员,实际上是整个社会价值观的一种缩影,她的选择并不孤绝和新异。进而言之,当下,官本位的思想仍然或多或少地主导着这个社会,一旦考上公务员,不止是预示饭碗的稳定,还有其他摸得着看得见的好处。

为什么那么多人考公务员?如果社会保障足够完善,人们有足够的安全感,还会争先恐后地希望工作稳定吗?事实上,真正有志气有想法有才华的人是不屑于稳定而没有挑战性的工作,但对未来的不可预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考公务员。因此,与其说是刘美艺害死了女儿,不如说,是庸俗的价值观和当前社会的集体焦虑感害死了晓琳。对这一血腥事件,除了对人性的追问,对家庭伦理的质疑,更应该逼问的是,当前惨淡的现实和公务员热背后的怪象。

现代快报再评

问“为何宁死不当公务员”,就跟问祝英台为何宁死不嫁马太守的儿子马文才,偏要嫁给穷书生梁山伯一样。祝英台她爹妈当然也是为了女儿终生幸福,当然也是出于自己和社会的经验,嫁给官员家比嫁给穷书生家风险系数小。拷问择偶择业观念产生的社会环境自然重要,做父母的尊重子女的选择更重要。

我不赞成将一切悲剧归因于社会的思路,我认为父母的专制是这个事件的主因。他们至今还以“为你好”开脱自己是说不开的,“人各有志”的常理他们应当懂,也应知所有专制行为都是在“为你好”“保护你”的旗号下进行的,总以为只有自己才代表了被压制者的长远利益。

政府被质询瓦解官场潜规则

让政府始终处于质询压力下 长江日报 3月11日 作者 刘敏

长江日报一评

我国质询制度起源于1954年宪法,当时叫“质问”,“文革”期间这一制度被取消,改革开放后,宪法恢复了质询制,随后包括2006年《监督法》在内的系列法律、法规都具体规定了质询权。

全国人大没有出现过严格意义上的质询案,但质询权在一些地方人大机关屡被动用,有效惩治了政府行政部门的违纪渎职行为。比如1989年湖南省31名人大代表对政府提出质询,一名副省长因此被罢免。

不得不承认,无论在范围上还是数量上,质询权的实际运用都相对乏力,一些人大机关或代表更倾向于采用询问等温和的方式。

人大会议,很多时候会有会而无议,有温情脉脉的询问而鲜见正面的质问交锋。我们认为,质询权是众多监督权力中可以体现出“议”和交锋性质的权力之一,如果稍显严

厉的监督方式处于人为虚置状态,那么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将会大打折扣。这就是说,那些沉睡的监督权力被激活很重要,激活的权力真正发挥出监督的能量,使政府始终处于政治压力之下,也很重要。

当然,质询权只是人大监督权之一,我们不能闲置和低估,也无须拔高质询权,将制约政府行政权力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质询权上,并不现实,也未必牢靠。从根本上说,对政府权力的限制,需要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和媒体监督等各种监督力量的充分体现,人大机关能否尽用现有的制度资源,司法能否不受干扰保持独立审判,媒体能否有更大的自主权和报道空间,都关系到行政权力能不能受到有效约束。

现在国家层面已作出承诺,我们希望这一承诺得到兑现,今年能够出现严格意义上的人大质询案,并以此为始,让压力政治从理念共识变成政治常态。

现代快报再评

全国人大启用质询权,其意义不止在于权力的制衡,即人大作为立法机关、民意机关、最高权力机关对行政权力的监督。要说制约和监督,行政机关本来就有同级党委的制衡和监督,但党委对政府的监督通常是机关内部运行的,有问题党委会上就讨论决定了。

人大对政府的质询案重要意义在于,它是面对民意代表,通常对媒体开放,受社会舆论关注和监督,体现了公众参与,更符合温家宝总理说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而多年来,我们的官员习惯了在官员的圈子里内部协调解决。这也是海南毒豇豆事件被武汉有关部门曝光后,海南农业部门抱怨武汉方面不讲义气,没有给他们和农业部面子的缘故。海南方面的理据是长期运行的官场“潜规则”。启动人大质询也是打破这种官场潜规则的有力手段。

指望垄断企业“自我革命”太傻太天真

垄断企业是收入分配改革的“七寸” 新京报 3月11日 作者 匡贤明

新京报一评

从现实情况看,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七寸”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我们需要国有企业来垄断某些行业,根本原因是它们“关系国计民生”。也就是说,成立垄断性国有企业为的是公共利益,而不能是个别企业的利益。

如果不厘清这个定位,垄断行业和某些国有企业永远有在市场上扩张地盘和提高自己收入的内在冲动。目前七成的央企进入房地产行业,七成的央企涉及经营非主业的宾馆酒店,这其中的动机就是可供自己分配的利润刺激,其典型口号为“央企首要任务就是赚钱”;而视公共利益为企业利益,则是垄断行业高收入的借口。

作为社会的公共财产,其运营、收益的分配理应用于严格的监督之

下。但现实是,垄断行业和某些国有企业,在主业上很大程度脱离了基本定位,在辅业上完全脱离了基本定位。许多所作所为,实质上把自己等同于一般的市场企业,把公共财产的增值视为自己经营的成效,并以此为自己高薪寻找借口。

如果不认清这个“七寸”,仅采取行政性“限薪”的方法等,很难打破垄断行业的畸高收入。可限的是看得见的薪水,不可限的是看不见的福利。根本出路在于,适应“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性,把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的公益事业改造为社会公益法人,其财产及运营参照行政单位管理,其考核不以利润为指标而以公共利益为指标,其员工薪水参照公务员报酬。考虑到市场因素,可以适当增加“市场风险贴水”,例如10%-20%。社会公益法人的运营利润,全部收归国有,纳入全口径财政预算范

围内,用于增加在社会领域的支出。

现代快报再评

要求分配制度改革、缩小贫富差距从规范垄断国企人员的收入开始也已讲了多年。这次“两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的发言最尖锐。她在会上发言指出:“垄断行业的国企占据了政策优势、资源优势、市场优势,以国家的‘长子’自居,却不管‘家里的穷人’。”但是她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到了需要‘自我革命’的时候”,这话至少对于垄断国企来说,是太傻太天真。

我觉得有委员说,先从国企的收入水平、福利水平向全社会公开做起,倒是很实在的措施。国企是全民所有,“股权”是全体国民的,凭什么不向全国人民公开相关分配信息?难道国企领导人和员工平均年工资福利分别是多少,也是国家机密?

这次两会,有政协委员提供材料显示,“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的员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其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左右”。因此,“垄断性央企高收入已经成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这也是收入分配改革短期可以见效的唯一可能突破点”。

(《每日经济新闻》3月10日)

本版特约主持人 鄢烈山

资深报纸编辑,专栏作家。新时期中国报刊新锐评论作者的代表之一,主持多个评论专栏。